

期待黎明

叶启政 著
传统与现代的搓揉

.....
理论和实践的搓揉——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理论雏形
文化优势的扩散与「中心—边缘」对偶关系
创造性转化的社会学解析
期待黎明——对近代中国文化出路之主张的社会学剖析
社会理路和历史建构——中国现代化之社会学诠释架构初探
再论传统与现代的斗争游戏——正规化的搓揉形塑
改革开放——中国现代化的再出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期待黎明

叶启政 著
传统与现代的搓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期待黎明：传统与现代的搓揉 / 叶启政著；—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ISBN 7-208-05554-8

I. 期... II. 叶... III. 现代化-研究-中国-文集 IV. D6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5144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牛瑞华



期待黎明：传统与现代的搓揉

叶启政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4.5
插页 1
字数 207,000
版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554-8/C · 199
定价 24.00 元

目 录

CONTENTS

目 录	1
第一章 理论和实践的搓揉——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理论雏形	6
第二章 文化优势的扩散与“中心—边陲”对偶关系	39
第三章 创造性转化的社会学解析	72
第四章 期待黎明——对近代中国文化出路之主张的 社会学剖析	99
第五章 社会理路和历史建构——中国现代化之社会学 诠释架构初探	128
第六章 传统与现代的斗争游戏	149
第七章 再论传统和现代的斗争游戏——正规化的搓揉形塑	162
第八章 改革开放——中国现代化的再出发	180
参考文献	205

自序

今年年初，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谢立中教授来函，邀请我参与他为北京大学出版社主编的一套丛书的撰写。当时，我欣然答应，也立刻着手整理过去30年间自己写过的论文。就在这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发表过的有关现代化的文章的数量还颇为可观，足够单独成书出版。于是，我决定不把这些文章纳入那本书当中，让它以完整而单独的姿态呈现在读者面前。

事实上，这些文章中的绝大部分，曾陆续收录在台湾出版的我的各种论文集中，如今，我把它们收集在一起，再添加几篇“背景”性质的文章，在大陆出版，自是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对我个人来说，更是别有一番价值。

在我的印象里，就人作为塑造历史（特别是现代化）之施为者的角度来说，在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一直被认为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基本上，我接受这个论点，尽管是以某些条件为前提的（至于这个前提，我在底下会提到）。因此，若能从社会学的立场来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施为者”的角色进行一些理论性的探索，应当是有助于我们理解整个中国现代化过程可能经历的“问题”的。于是，我就以过去所写一篇讨论知识分子之社会角色的理论性文章作为首章来为整本书“破题”，为铺陈整个论述作基础，并借此勾勒出它所能扮演的角色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性的局限。

其次，自从1974年由美国返回台湾任教以来，我就一直认为，整个现代化涉及的众多课题可以浓缩成为一个基本命题：在日渐形成（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应当是“已形成”）的世界体系里，“中心”与“边陲”地区之间

的关系本质上是不平等的。这是我在第二章中所讨论的课题，尽管整个讨论一样地也是极具理论性的。事实上，我一直深信，必须以所谓理论的层次来看待这个现象，整个问题的基本症结才会有着具启发性的“清明”的可能。在这篇文章中，我特别提出“生机控制性”与“文化优势的扩散作用”作为两个核心概念，并进而与知识分子作为带动变迁的“施为者”的概念相互扣联来进行讨论。期盼读者能够特别地垂青这两个概念。

在即将进入1990年代之际，杜维明与林毓生两位旅美的华人学者同时提出了“创造性转化”的概念。他们使用这个概念来解说、也同时期待中国文化传统（特指儒家思想）所可能开展的时代意义。我个人深表同意，这一概念对理解19世纪以来整个“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尤其，若我们欲对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有所“期待”的话，把这个概念用来作为一个不能不关照的重要环节，应当是可以接受，也是有一定的意义的。有鉴于此，我在第3章中对这一概念，特别是林毓生教授的见解，提出了一些具理论意涵的社会学诠释和批评。对我个人而言，这样做有一些私心的期盼，我期盼的是，借此能够整合到本书第1章与第2章中所提出的理论架构之中。这三章所提供的论述构成了本书关于“现代化”现象的基本认知架构，并作为分析和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基础。

至于第4章与第5章，就其表述的内容来看，分析的对象是19世纪以来发生在中国的一些历史事件，尤其是对来自西方之“现代化”的种种不同认知反应，特别是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上面的。但是，作为作者，我想强调，在这两章中整个论述的原始动机还是在于尝试建构一个用来诠释“现代化”现象的社会学理论。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两章的论述不只是衔接着前面的第1章至第3章，也与紧接而来的第6章与第7章的论说相扣联，而第6章与第7章这两篇相连贯的论说，可以说是最为接近我当前理论论述的作品。

假如根据上面设定的标准来看，真正对中国现代化从事经验性的描绘的，只有最后的第8章了。说来，这一章是最晚近写就、但却是最感心虚的

作品，因为，对其中所描绘的内容，我个人缺乏真切的实际经验和历史的临场感。我所能做的，只是根据一些间接资料与个人观察，佐以个人长期以来在社会学理论上之“学理”性的认知来进行论述。说来，这样的论说取径是轻率、也是危险的，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但“丑媳妇总得见公婆”，也只能先把它呈现在读者面前，让大家公审，留待条件成熟后再行修正了。

依我个人的意见，包含在这本书中的所有文章，可以说都是属于“通论”性质的论述，许多的表述，都无法做到更加深入而细致。毋宁说，整个讨论是相当概括而粗糙的，概念的陈述更是多有暧昧而模糊之处，值得进一步细论的地方甚多。尤其，写作横跨20年（从1984年至2003年），不同的文章在写作的当时所需要关照的场合不同，对象也有所分殊，再加上我个人的思想与看法，也随着经验的累积不断在“精进”之中，因此，其中的论述难免有重复、相互矛盾之处，在此，是必须先向读者们说明并致上歉意的。以严格的标准来说，在这本文集问世之前，我实有义务将这些重复或矛盾之处一一删除，也把矛盾的地方一一修改过来的，但是，我并没有尽心尽力地做到。推其理由，我个人找得出来的有二，在此，应当对读者们作个交代。

第一，我担心年轻一代的读者们没有耐心把整本书读完，而只是抽取其中感兴趣或需要的来阅读。为了让这样的读者在选择而跳跃地阅读单篇文章时，对概念的理解上有着较为贴切的感应，我决定把那些自认为重要、原先就多有重复的概念表述形式尽可能地保留下来。况且，诚如我刚刚说过的，这些文章的写作横跨20年，在不同的时期为了关照到不同的读者，写作形式是不尽如一的。在此状况下，若说要重新改写并全部调整重复的地方，平心而论，是一项庞大的文字雕琢工程，而这偏偏不是我现在手中所能掌握的时间做得到的。

第二，我个人承认，最不能推托的是，书中的论述前后有矛盾的地方理应修正，尤其，疏漏不足之处更是应当补充，但是，基本上，我也并没有做到。之所以如此，最简单、但可能是最不能原谅、而却又是被我用上了的理由是“偷懒”。不过，在此，我还是得替自己作点辩护，毕竟这是一个相当

现实的理由。我的理由是：比起重复之处，对于论述有着矛盾与疏漏而需要进行补订的工夫，做起来是更为耗时耗力的。更重要的是，整本书中的所有文章，基本上是倾向于理论性的，若说必定要把我个人在 20 年间不断在“改进”中的想法完全调整过来而臻至完美无瑕的“清澈”境地，那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修补工程，目前要我从事这样一项艰巨的工程，无疑地是一项严酷的“惩罚”。说真的，倒不如把这些过去所写的文章全都丢了而重新来过。大家于心何忍？何不把这部分的工作，留给后来的社会学者去做。就算我有意想继续做，也应当给我一点时间，看看以后是否有这个缘分再说。

好了！为自己的种种不是找下台阶的推托话语，已说得过多了，该是停止的时候了。再说下去，读者们会感觉到不耐烦，甚至会提出抗议的。不过，在结束这篇序言之前，还是请求读者们允许我再多说一些话，当然，是与上面所说的不同的话。我想说的是，聪明的读者们，你们应当可以看得出，我以讨论知识分子的文章来开题，显然有强调知识分子在一个（特别是所谓的“边陲”）社会推动现代化过程中是具有特殊且举足轻重的决定角色的意思。我不否认，在 20 年前，我尤其是持有着这样的“精英论”的想法，而且，到了今天，我还是认为，这样的看法基本上还是具有一定之历史经验性的意义的。换言之，至少，对中国而言，在可预期之将来的一大段的“现代化”进程里，知识分子还是如过去一般，将一直扮演着吃重的角色，继续担负起推动现代化的“火车头”的工作。

然而，必须指出，在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纵然知识分子是不容忽视的决定性角色（特别是在早期阶段），但是，这并不宜让我们因此就过度夸大其所可能涵盖的社会意义（特别是社会学的意义），而以为这一群常常自认“先天下之忧而忧”、且对社会充满强烈使命感的特殊群体，是决定整个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甚至是惟一的关键力量。以这样的精英论来理解整个现代化的进程，是过于乐观、过于单纯，甚至是危险的。依我个人的意见，我们还需要特别重视大众，尤其是所谓的中产阶级或我在第 8 章中谈到的所谓的“新阶级”所形构的大众在现代化过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这将有助于弥补

过去诸多论述过于强调社会精英（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角色。回顾欧美社会的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在现代化进入中、后期以民主与消费导向为主调的历史阶段中，大众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是必须予以重视的。因此，无论就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还是就理论构思的演绎层次来看，当我们考察现代化进程时，在在都需要走出强调“精英论”的传统思维架构，而创造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心态。这才是我在整本书中所希望说出的。

最后，我要感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的同仁们。倘若没有他们愿意接受这本书，没有他们细心而尽责地进行着编辑、校对及其他的工作，这本书是无法与大家见面的。

叶启政

识于台湾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室

时 2004 年 7 月 21 日

……一、前言……

19 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大举向外扩展，几乎影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就中国而言，自 19 世纪中叶起，就因抵挡不了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人侵，整个社会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变动。这个变动已不是以往历代所经历的那样只是换汤不换药一般的单纯改朝换代，而是从上到下、由外而里之遍及举国各层面与各角落的根本变动，而且，变动还一直延续下去。在此变动之中，由于其基本诱因乃来自具有高度生机控制优势性之外来异质文化（简单来说，即西方现代理性科技文明）的冲击，中国人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于外来与传统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或更积极地说，如何使得整个社会脱胎换骨，缔造成一个具崭新生机的文化体？^{〔1〕}基本上，此一平衡点的寻找或脱胎换骨的努力所涉及的，不单是个人之心理认知与感受的调适，同时也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与种种社群关系之整体社会秩序的重建问题。再者，这更不单是认知上的理智判断而已，它也涉及情感上的认同归属问题。尤其，就整体社会来说，这自然并不只是攸关争取独立自主的机会，因为这样显得太消极了，而应当有着更为积极、远大的目标。说来，这个目标本质上是属于所谓文化的面向；或者，以简单的话说，即未来共同理想的

〔1〕有关生机控制性以及相关现象（尤其涉及世界体系的“中心—边陲”二元性）的理论性讨论，参看本书第 2 章。至于有关西方现代性对近代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冲击影响，作者个人的分析与立论立场，可参考叶启政（1981）与本书第 3 章。

缔造。

就已展现的影响和结果而言，如此气势磅礴的变动影响所及的，不只是社会中的精英分子，而且也波及广大的民众。因此，调适所带来的心理阵痛，也不只是局限于精英分子。一般市井小民，在日常生活中，也因为变迁的巨大与快速，或多或少地承受受到种种的现实压力，有着调适上的问题。譬如，在197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变动并不输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所经历的变迁。根据其在中国所做的调查，周晓虹（1999：31）指出，由于社会变迁加剧，新事物和新规则层出不穷（如计算机的普及化导致日常生活的种种活动必须仰赖电子信息科技），导致了家庭中上下两代原有的权威关系开始松动，而且，甚至出现了颠倒的情形。在这样的变迁格局之下，亲代原有的知识、经验，甚至价值判断多丧失了解释力和传承价值。尤有进之的是，子代第一次获得了“指点”父母的机会（诸如指点不识字的父母如何搭乘地铁、观看红绿灯、操控录像机，等等）。周晓虹（1999：44）即称这种“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为文化反哺现象。当然，文化反哺现象只不过是社会剧烈变迁下的一个小小例子而已，尚不足以周延地刻画出整个社会变迁的元神。在此，只是信手拈来，聊作佐证而已。

总的来说，面对着急速、且连续不断而来之变迁因子的冲撞，社会中虽有一部分人反应敏捷，有无限的关怀，力图扭转困局，但大部分人总是反应迟钝，甚至对世事漠不关心。即就那些寄有关怀，勇于面对，力图扭转变局的人们来说，也总有一部分人常处于乏力无奈的状态。当然，一部分掌握有相当社会资源的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一般所谓的精英分子即是属于这一批人，而所谓的知识分子亦是其中有机会搭乘这辆充满机会的车辆的一群人。当然，他们能否搭得上，端看各种社会条件是否配合。

事实上，打开人类历史（尤其中国历史），我们所看到的记载，绝大部分是精英分子的活动及其带来的社会效果。然而，吊诡的是，没有广大群众的活动来支撑，只靠精英分子设计的实践活动，人类的历史是无法塑造成形

的。人类的社会活动，原就是全体社会成员活动的组合结果。精英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就有如锣与槌之间的关系，要使锣响，就必须有槌子，也必须用槌子去敲打。只是，或许，精英分子顶多是有如执了槌子的人，他并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思，决定怎样敲或什么时候敲锣，在决定敲打的时机与方式时必须顾及到观众（在此乃指大众）的喜好。在今天的民主社会里，这样的情形更是明显。

总之，我企图表明的是：在一个社会中，精英分子与大众具有一定之结构性的关系，彼此之间是相互依赖、也相互作用着的。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某种适当的社会条件下（例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或政策厘定的时候），精英分子（尤指知识分子）在指导、检核与实践变迁的过程中，往往是位居较具决定性的地位。本章探讨的主旨即在于分析知识分子的社会意涵，尤其着重其社会角色之本质的分析，而我深以为，这样对知识分子从事理论性的解析，再怎么说明，都将有助于了解特定地区之知识分子的问题的。不是吗？

…… 二、知识分子的社会意涵 ……

对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及其意义的讨论，学者之间虽有看法上的分歧，但还是可以寻找出一些共同的脉络。^[2]以最简约的方式来说，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乃建立在文化象征上面。曼海姆（Karl Mannheim）曾为知识分子下过如此的定义，他说知识分子是“一群人，其特殊的任务是为该社会提供关于世界的解释”（Mannheim, 1936:10）。换句话说，在曼海姆的眼中，知识分子乃是一群善于对宇宙、人生、社会制度与文化成品从事象征性之诠释的人们。与此同时，他们也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意义与价值皈依架构。准此，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可以说立基于对社会的基本

[2] 到底知识分子是什么，学者之间意见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主张采取类似千层糕的方式来定义。有关此一说法较为详细的讨论，参看叶启政（1977, 1979, 1991）。

象征从事建构、修饰、诠释和批判的工作上面。说来，这正是我所以宣称知识分子的社会意义本质上是具文化象征性的理由所在（Ludz, 1976）。

以文化象征的立场来为知识分子的基本社会意涵定位，是诸多西方社会学者共同的看法。譬如，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从发生学的立场为知识分子产生的条件与社会角色定位。他指出，知识分子所以产生，有两个社会条件是绝对必要的：其一是文字的发明和象征的使用；其二则是哲学的突破（Parsons, 1969）。换个角度来说，这也就等于把知识分子的基本社会属性定位为处理象征符号和善于运用抽象观念的一群人，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核心意义乃在于担当“精炼观念”（idea - articulation）的任务（参看 Shils, 1958, 1974; Lipset, 1963, 1969; Eisenstadt, 1973）。显而易见，他们的这些说法分享着一个共同的含义，即强调知识分子在文化象征现象上的意涵。

回顾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即：文字是使得人类过去经验能够保存和累积下来的主要媒介，更是一个人要从事有限之亲身经验的局限中扩充见识和添加经验的一种有效工具。进而，象征的使用让人们有机会超越种种具体（特别是物质）的形式，并产生出抽象的意义。对人类而言，其为万物之灵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即在于其生活追求着意义。整个社会生活运作的本质，说穿了，就在于它具有象征意义。因此，一个善于使用抽象象征、并能运用文字来表达的人，在社会中往往有着特殊的地位，其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自然也就不一样了。

从社会角色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知识分子其实是一群在社会中比一般人更善于使用象征符号、并且禀赋哲学性之思维能力的人。^[3]于是，在社会里，他们被赋予或自认为有着解释宇宙与人生之意义的责任。此外，他们更是以创造、修饰、保存、诠释、传散和经常使用具象征性的文化物品见长于

[3] 所谓哲学性的思维能力，其实际指涉的应当是具备一定的使用抽象象征符号的能力者。从这一角度看，初民社会的巫师或欧洲中古世纪的教士，可以说是近代知识分子的雏型，他们与之有着相贯连的社会特质。简单来说，这个特质就是善于运用象征符号，且以此在社会里获取地位与声望，并扮演社会角色。

社会 (Shils, 1974; Ludz, 1976; 叶启政, 1977, 1979)。换句话说, 社会成员们生产的成果, 即使只是一栋建筑、一件瓷器、一幅画作甚至一张桌子, 往往需要经过这批人象征性地诠释、修饰、传散和再造, 才能取得作为文化传统的正当性 (legitimacy)。准此论述为基础, 于是乎, 当我们宣称“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精英, 其本质是表现在文化上面”时, 这样的说法就可以得到证成了。^[4]不过, 在此, 必须特别提醒的是, 固然知识分子的社会意涵始于文化, 但并不是局限终止于文化的层面。理论上, 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说是多元、甚至是全面的, 只是其关系的建立基本上是由文化象征来挂钩的, 而这也正是我一开始即强调知识分子之文化象征意义的要旨所在。

以上对知识分子之文化象征意义的描述, 似乎是侧重其文化创造与建构的层面, 让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的“理想建构性”, 或简称为“理论性”。但是, 人不仅是观念的动物, 也是行动的动物。人类不可能只停留在创造、修饰或诠释观念的工作上, 而是进而企图运用抽象观念来指导行动, 以满足种种的需要。更重要的是, 人类有实践其理想的动机倾向。实践 (或称行动) 也是人所具备的基本特征之一, 知识分子亦不例外 (Etzioni, 1968)。只是, 就整个社会 (尤其文化传统的历史传承) 的角度来看, 知识分子的实践性具有更为特殊的社会意涵。

就广义的定义来看, 知识分子所涉及的文化象征对象, 同时包含着自然现象和人文社会现象。就自然现象而言, 知识分子的实践活动, 即在于如何把有关自然现象之较抽象的基本知识, 转换成为具有技术实用意涵的知识, 甚至再转变成为具体可用的工具, 以运用于实际的日常生活之中。就人文社

[4] 相对于知识分子, 政治权力拥有者可以看成是实践文化象征的精英, 他们使得具正当性之文化象征落实为整个社会制度的一环。至于有关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 (或广义地说, 精英分子) 之性质与其转变的分析, 除了上文或下文中所提到的之外, 我特别选择了一些文献提供给读者, 计有 Aron (1957)、Benda (1959, 1969)、Shils (1968)、Foucault (1977)、Konrad & Szelenyi (1979)、Jacoby (1987)、Bauman (1987)、Boggs (1993)、Eyerman (1994)、Said (1994)、Karabel (1996)、Goldfarb (1998) 与 Pels (2000) 等。

会现象而言，则是如何把有关人与人群互动活动的种种基本知识，转换成为可运用于政治、经济、家庭、教育、社区活动等方面的知识，借此以规约（或指引）个体的行为，并进而促使某些理想在现实人世间的实现。因此，不论是就自然现象还是就人文社会现象而言，知识分子之实践的意义，基本上，并不在于满足他个人或其所属之初级团体成员（如家庭成员或挚友）的实践行动上面，而在于以某种行动方式促成具有制度性之社会机制的建立。用最平白的话语来说，就是：知识分子为的是“公”利（如伸张社会公平、正义、人身自由的保障，等等），而不是个人“私”利。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的实践性涉及社会整体的制度性意义，而一般大众的实践性则往往只是满足个人或初级团体的需求而已。正因为如此，有些学者认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意识与历史使命感”乃知识分子的本色（Dahrendorf, 1969；金耀基，1971；刘述先，1973: 165 - 168）。

既然知识分子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性格，其理论性和实践性如何完成，两者之间如何挂钩，对社会本身又具有什么意义等等，均成为必须追问的问题。然而，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有两个密不可分的现象是不能不提的。这两种现象可以使用“转型”与“安置”两个概念来形容。所谓“转型”，指的是根据内在理路，一个状态转变成成为另一个状态的过程。譬如，把二进位的数学概念转变为计算机的基本线路；把有关人的基本学习历程的心理学理论转变为实际的教学方法等。所谓“安置”指的则是，由甲状态转变成成为乙状态后，如何让乙状态逐渐定型下来的塑造过程。譬如，政府形态由独裁专制转为民主宪政体制之后，民主宪政如何予以制度化，以使能够具体落实，即属安置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任何现象的衍生都同时包含着转型和安置两个过程。这两个方面不但存在于理论转为实践之时，也同时分别存在于理论的形塑与实践的贯彻过程的本身当中。因此，论及知识分子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社会意义时，我们势必面对三个阶段性的问题。它们分别是：（1）理论如何转型和安置；（2）理论如何转型为实践；（3）实践如何转型和安置。下面，就试着对

这三个过程作简明扼要的阐述。

…… 三、知识分子之“理论—实践”的 转型与安置社会过程 ……

基本上,上述三个有关知识分子之“理论—实践”的转型与安置的阶段衍生和转换问题,属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其中涉及的问题甚多,自然无法在这篇短文中一一谈到。在此,我只提出一些比较属于原则性的论点作为分析的主题。但愿在讨论特定社会的知识分子现象时,这样的理论架构有助于理解与解释。

首先要指出的是,若欲澄清上述的三个问题,必须从“诠释”和“正当化”两个概念入手。大体而言,转型过程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诠释的功夫。而就社会整体而言,诠释原本即是知识分子这一社会角色所赋予的核心任务。面对着世界(不管是自然或人文社会世界)的林林总总(包含诸如某一个观念,制度,人际关系的体现,社会事件,乃至物质器用,等等),他们依不同的社会与文化条件,从事着诠释并赋予象征意义的工作。事实上,也正因为是如此,我们才认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文化象征的创造与诠释过程中,才具有着韦伯(Max Weber)所说的卡里斯玛(charisma)特质(Weber, 1968)。

不同于转型过程的重点在于诠释,安置过程最主要的问题则在于如何“正当化”。这涉及:如何使得一套经过润色诠释过的“文化体现”产生正当性,并进而成为社会中具代表性的规范模式或行为典范。使用韦伯的术语来说,安置即是使一套经过多次诠释而成的“文化体现”例行化(routinization)的文化体现(Weber, 1968)。若从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角度来说,转型是属于意识化的过程,而安置则具有潜意识化的意味。说得明白些,转型必须是先把既有、且习以为常(即已被潜意识化)的状态,再度提升到意识的层面重新加以反省批判,进而添加入一些新的成分(也就是再诠释),

才可能转而进入另一个的内化 (internalization) 状态。而此一新的内化状态一旦具形之后, 若不再经由种种社会化的渠道加以拿捏塑造、并进行潜意识化的功夫, 则无法在行为或制度上产生精简效果 (叶启政, 1984a)。因此, 安置过程的基本意义, 即在于使一个已具形的状态, 能够以相对普遍且理所当然的姿态进入社会成员的认知与感受体系之中, 以成就共同接受的“文化体现”。

使用以上的概念来观察与分析知识分子之理论面向的转型和安置, 我们发现, 其最主要的社会意义有二: (1) 使一个理论的独特性与普遍性同时能够顺利转换; (2) 使理论的抽象程度能够提升或降低。因此, 此一层面的转型和安置, 本质上乃是具有双向转换之可能性的一种社会过程。在此, 必须提醒的是, 此处所谓的理论独特性和普遍性, 有着特殊的指涉意涵, 需要加以界定。否则, 在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时, 很可能立刻就会引起误解。

当论及理论的独特性和普遍性时, 一般乃从命题的可能有效涵蕴或指称的意义范畴的大小来界定。但是, 把知识分子的理论建构活动当成是一种具有社会互动性的活动来看待时, 我们就不能只从命题涵蕴范畴的角度来界定独特性和普遍性了, 而必须从理论的传布和饰化 (或谓转型) 的社会过程来考察。在此,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 任何理论通常都是由一个人或少数人所创造的, 一开始即反映着创造者的特殊认知和感受, 原是充满着个性色彩的。但是, 倘若理论建构只停留在此一格局, 那么, 它将只是属于创造者私人所有而已。对社会整体而言, 它多是隐而不彰, 甚或是转瞬即逝的。如果以有限而隐蔽的方式来传递 (就有如通常所说的邪教), 理论只能局限在有限的人群当中流传, 难以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认知和感受模式。而在开放、民主且科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 理论的建构和传散并不是以个人零星的方式来进行的。毋宁说, 它往往是动员集体力量, 以制度化的形式 (如大学的设立) 来推展的, 其中包括专业人员以特定制度化的认知、诠释 (如科学法则) 和传播 (如教育体系中的授课) 方式所从事的诠释、修饰和批判工作。在此情形下, 理论很难只是保留着私人格局, 而往往经由某种媒介 (一般是文字与